

## 从刘逮情杀案看民国职业法律人与司法传统的断裂

胡弼渊

**摘要** | 1935年3月16日,刘景桂于志成中学女校枪杀其情敌滕爽,引发了普罗大众和法律界人士的共同关注。围绕着刘逮情杀案,媒体展开了诸多讨论,呈现出旺盛的公共情感。职业法律人的评述与媒体相比,有不同的问题意识、论证思路:其往往依据实定法,侧重于对案件进行教义学分析,且这些分析有较为相似的方法论。这种倾向于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应被视为新兴法律文化的体现,与清代的“情、理、法”案件审理传统之间存在明显断裂。刘逮情杀案中职业法律人的评述、文书应在清末民初法律变动的背景下,被理解为司法近代化的表现之一。而在司法近代化真正实现之前,一个独立的现代法律职业群体已经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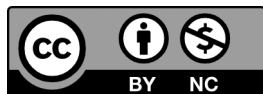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司法传统;法律文化;职业法律人;刘逮情杀案

**作者简介** | 胡弼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史学。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1935年3月16日,刘景桂女士于志成中学女校枪杀该校体育主任滕爽。行凶后,刘女士被捕。因刘景桂和滕爽都据传与著名运动员逯明有婚约在身,故成一时轰动之情杀案件,受普罗大众和律界人士

的共同关注,<sup>[1]</sup>各家媒体对此案进行了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报道侧重点迥异,有记述案件进程者,<sup>[2]</sup>有描写刘景桂<sup>[3]</sup>、逯明<sup>[4]</sup>等人的狱中生活者,也有诸多评论性质的文章。<sup>[5]</sup>这一案件的余波甚至远及十年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都有

[1] 《北平法院门前人声鼎沸》,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19日,第6版。该文记载,刘景桂案尚未开庭,法院门口就有上千人聚集,争相围观。

[2] 《铅球健将逯明之妻滕爽被击七枪惨毙》,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月17日,第六版。

[3] 《读书作画看小说 刘景桂狱中生活舒适》,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5月17日,第十版。

[4] 轩:《狱中渡佳节 刘景桂大啖广东月饼 逯明为明月写真》,载《民声报》1935年9月13日,第四版。

[5] 马宏毅:《对于刘滕惨案宣判后的一点感想》,载《月华》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6页。

媒体对此案当事人的情况进行跟踪报道。<sup>[1]</sup>

这样一起因出轨而引发的血案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是令人惊讶的。在今天人们的历史记忆中，1935年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密集的年份：这一年，中国经历了红军长征、国统区币制改革、年底的《抗日救国宣言》和“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世界史上，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建立了武装力量并开始征兵，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入侵，法西斯政权正逐步延伸其触手——1935年有太多令人无法忽视的大事发生，我们很难将其认为是寻常的年份。

然而，对当时中国的公共媒体而言，1935年的世界远不能用“法西斯势力扩张，国共对立加剧”这样的宏大叙事概括。在媒体们看来，这许许多多的政治事件似乎并不比刘景桂案这一平凡的情杀案件要特殊，因为从1935年开始，各家媒体对刘景桂案进行了上千篇的报道，这种关注贯穿全年。媒体们在此案中倾注了太多案件之外的关注：一起小小的情杀案件让时人联想到了妇女解放运动、性别平等等一系列议题，而汹涌澎湃的公共情感则折射出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焦虑。这样的落差使我们可以将刘景桂案作为一个透视1935年这一时代的窗口。通过这些丰富的一手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年代，一个职业法律人区别于公共媒体的年代，一个司法近代化进行中的年代。

这起轰动一时的情杀案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细致研究。已有的学术研究一部分侧重在事件还原的基础上，<sup>[2]</sup>梳理法律领域中刘景桂案之审理所体现的法治因素。例如，有学者认为刘景桂案“无论是在辩论庭上与控方、对辩方的唇枪舌剑，还是庭下

与当事人的沟通、与媒体的互动，都充分体现出律师执业实践中对现代法治精神、人权的尊重，以及对情感与法理有策略地运用”。<sup>[3]</sup>类似的研究也可参见肖秀娟于2011年所作的《民国律师执业活动研究》。<sup>[4]</sup>在该文中，肖秀娟提出刘景桂案中刘景桂一方的辩护律师刘煌以各种方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辩护，并据此将刘煌律师的执业过程作为民国时期律师职业的代表。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刘景桂案中的司法实践与公众道德观之间的张力，认为本案体现了“近代法律移植在文本上的高歌猛进、大众媒体的盲目引导与社会法律文化变迁缓慢的矛盾”。<sup>[5]</sup>

另一部分研究则是从媒体对刘景桂案的评论出发的。李文健提出，该案的媒体报道“反映出文化评论家们在面对新女性、新的媒体力量、新的公共叙事方式时潜藏的不安”。<sup>[6]</sup>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也着重考察了刘景桂案这一个案的媒体呈现，例如林郁沁（Eugenia Lean）便以微观史的视角，提及了刘景桂案展现出的民国时期中国公共空间内的公众情感。盛行的公共情感一方面寓意着北京（北平）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与上海形成对比的“保守”城市，另一方面也能描绘出“精英们对公众同情的矛盾态度是如何复杂地与大众媒体和威权政治日益增长的力量相纠葛的”。<sup>[7]</sup>

与前述文献不同，本文聚焦于本案司法审判和媒体评述中活跃的职业法律人们（本文以“职业法律人”一词统称所有职业上与法律联系紧密的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彼时的公检法工作人员、律师，以及法学学者等）。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律师等职业法律人的兴起，是历史的产物。而这一新的职业群体的形成，也是司法近代化的体现。<sup>[8]</sup>然而，

[1] 丁一彦：《北平小姐刘景桂因争男朋友以抢击毙女教员滕爽之轰动全国惨案，经判无期徒刑，七七事变，经伪法令数免开释，兹法院以伪令无效，刘女又重拘入狱》，载《一周间》1946年第6期。

[2] 马静：《民国北京犯罪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306页。

[3] 邱志红：《从“刘遑情杀案”探测民国北平律师的执业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4] 肖秀娟：《民国律师执业活动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5] 张淑娟：《民国女性性解放与贞操观的吊诡及司法判论析——以1935年北京刘景桂案为中心》，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6] 李文健：《“展示”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婚恋事件的媒体叙事》，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7] [美]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陈湘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

[8] 李严成：《民国律师公会研究（1912—1936）》，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仅仅是一类名为“律师”“法官”的人出现,并不意味着他们成为独立的群体。相反,正是在这类人群共享的语言、技术和对法律的认识中,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职业法律人——诞生了。而这类共享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以及法律语言,则构成了新的法律文化,与清代以来的司法传统形成割裂。<sup>[1]</sup>为此,本文意欲将刘景桂案置于“司法近代化”的大背景下,结合本案案卷以及职业法律人在媒体上的评述,考察此案中职业法律人们所体现出的与司法传统的割裂,以期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

## 二、刘景桂枪杀事件始末

1935年3月16日晨十时许,北平西四牌楼南丰盛胡同私立志成中学女校发生枪击案。翌日,《大公报》<sup>[2]</sup>等报纸多以大版面报道之。此后,各大媒体(如《北平晚报》<sup>[3]</sup>)均有跟进,不断邀请各界人士进行评论,案件审判时旁听席也是一座难求。<sup>[4]</sup>综合媒体报道和案件卷宗来看,此次枪杀事件并非一时突发激情所致;相反,此案可谓渊源颇深。

刘景桂,察哈尔人,毕业于察哈尔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4月11日,经刘景桂的同事张选阁马做媒,刘遯二人订婚。然而,一个多月后,遯明寄信给刘景桂,声明解除婚约。刘景桂并未同意,然而遯明对此不管不顾,径自与滕爽在同年11

月1日结婚。滕爽是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女性体育家(大学时期,滕爽“每逢运动会,辄名列冠军”,被称为是“北平师大体育四健将”之一<sup>[5]</sup>)。刘景桂听说此事之后,“愤欲与讼”。经中间人调解,遯明以600洋元的代价在1934年2月11日与刘景桂解除订婚之约。

然而,此事并未就此停息。刘景桂追念旧好,于1934年3月4日<sup>[6]</sup>、3月9日<sup>[7]</sup>各向遯明发去信函。在信中,刘景桂热烈地表达了她对遯明割舍不掉之心,甚至称自己是“上帝面前的一名囚徒”,注定要“承受着人间一切的体罚”。此外,她还认为遯明同样放不下自己,表示“我(指刘景桂)知道你(指遯明)为我自责,为我伤感,为我泣哭”。3月15日,<sup>[8]</sup>遯明回函,称“我是辜负了你的”,并邀请刘景桂见面。初审判决中指,<sup>[9]</sup>二人“此后情书往来,各道爱慕至数十次之多”,并在北平、宣化等地“欢会不绝”,遯明对刘景桂的称呼也从“贞妹”变成了“我亲爱的贞妹”<sup>[10]</sup>。但在缠绵悱恻之下,刘景桂却对滕爽起了杀心。一来,滕爽是刘景桂唯一的情敌;二来,刘景桂受遯明600洋元的调解,其中有洋百元是滕爽资助的。于是,1935年3月15日,刘景桂开始实施她的杀人计划。

案发前不久,滕爽至志成中学女校任教。<sup>[11]</sup>1935年3月15日当天,刘景桂因担忧门卫阻拦,约志成中学女校(即滕爽工作之处)学生阎秀峰下午三点同往志成中学,并由不知情的阎秀峰带入学校。然

[1] 方乐:《民国时期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

[2] 《铅球健将遯明之妻滕爽被击七枪惨毙》,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月17日,第6版。

[3] 《今晨在严重戒备下开庭辩论终结》,载《北平晚报》1935年4月23日,第2版。

[4] 《刘景桂杀人案开审》,载《电影时报》1935年4月11日,第8版。

[5] 宗惟康:《北平师大体育四健将林斌张玉彭静波滕爽》,载《图画时报》1931年第748期,第1页。

[6] 《刘景桂寄遯明信》(第一号),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321-322页。

[7] 《刘景桂寄遯明信》(第二号),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323-324页。

[8] 《遯明致刘信》(第一号),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553-554页。

[9] 《“刘遯案”北平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书》,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5页。

[10] 《遯明致刘信》(第十六号),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612-613页。

[11] 《三角案主角滕爽女士小史》,载《玲珑》1935年第5卷第12期。

而，她们未能碰到滕爽。随后，晚七八点钟，刘景桂又独自两次来校，然而一直未能遇见滕爽。于是，刘景桂向校役询问了滕爽的在校时间，第二天上午十点化名李振华，重新进入了学校。她以假身份到宿舍拜访了滕爽，连开七枪，杀死了滕爽。谋杀滕爽之后，刘景桂试着离去，却被校役们追回，并报警送案。

刘景桂被捕后，此案先后经过三次审判，而刘景桂本人的刑罚也从最初的十二年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再到两次减刑直至出狱。<sup>[1]</sup>但在进入职业法律人的视角之前，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公共媒体的观点，以与职业法律人的言论形成横向对比。

### 三、刘景桂案的媒体呈现

围绕着这起知名的凶案，媒体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这些报道首先聚焦于对当事人个人的评价。总的来说，尽管批评逯明、同情滕爽是主流意见，但批评和同情的视角也因人而异。除此之外，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对刘景桂本人的评价在该案初审宣判之前和宣判之后有诸多不同。

在刘景桂案审判之前，便有不少直截了当且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刊发出来。例如，《北调》杂志的一文便以“现社会本来就是逼人犯法的社会”开篇，并称刘景桂的杀人行为是对不平等的男女私德要求之反抗，是“令人钦佩”的。<sup>[2]</sup>类似的观点促成了对滕爽的批评，《北方公论》刊文，<sup>[3]</sup>称滕爽为无辜受害者过于武断。“逯明与原妻离婚和与刘景桂解除婚约，大部金钱，都是滕爽拿出来的。”因此，滕爽“断送两个女子的终身幸福，不啻无形杀人”，不可谓无辜之人。

然而，对刘景桂的正面评价虽然在初期多见，却为诸多媒体所批评。这种批判的态度在判决公布后更为盛行，例如《国闻周报》在刘景桂案判决后的第二天综合了庭审和调查结果后转载了《大公报》的社论，<sup>[4]</sup>认为刘景桂远远谈不上无辜或是悲壮，相反，她的行为是冷酷的谋杀。刘景桂“经相当手续，与逯明解除婚姻，收受偿金”，却在此之后又和逯明“奸宿客栈，继续五夕”。这等浪漫关系之下，却选择将仇怨对准无辜的滕爽并开枪射杀，属实冷漠无情。这等“残酷无比，律当偿命”的人不应受如此之敬意。

如果说对刘景桂的评价尚因受到判决信息披露的影响因而呈现出割裂的状况，那么对“负心男子”逯明的唾弃则显得众口一词了。案件发生次日，《大公

报》<sup>[5]</sup>即以“祸首逯明”为题刊登了逯明的照片。不同于刘景桂，这种负面评价即使在逯明被一审判决无罪释放后也没有改变。认同法院判决的《国闻周报》就对逯明表示了鄙弃，称逯明“就道义言，实是罪人，就社会言，真属败类”，法院不惩罚他的原因只是因为法院只从事司法职能，当依法审判罢了。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对逯明的批判也未必全是进步的象征。例如刚才提到的《研究与批判》斥责逯明的出发点之一便是“倘然刘景桂之失贞操于逯明……在她与他订婚后而在他与滕爽结婚前，那么逯明是不应该抛弃她的”。当然，这位作者更像是站在社会常见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他本人在该文中的其他论述可以推知这一点（例如，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今天底社会状态之中，女子对男子仍有附属性的存在”）。

除此之外，公众同样关注三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北洋画报》便主张，<sup>[6]</sup>无论如何刘景桂总算是一个以直报怨（虽然手段有误）的女子，本案所揭示的也正是恋爱的力量。中国的许多人过于看轻了恋爱，事实上，恋爱并不是小事，因为“恋爱得其正，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有和美家庭，然后有强健的国家；恋爱不得其正，则社会必纷乱破败，一般青年惶惶不可终日”。

总之，这一系列或保守或进步的评论都共同展现出了社会公众面对负心汉和冷血杀手（或是快意恩仇的侠客）的情感投注与道德判断。此外，媒体也就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性别不平等、<sup>[7]</sup>对男性的

[1] 南燕：《十年前桃色惨案“杀人小姐”刘景桂将出狱》，载《海报》1945年6月6日，第1版。

[2] 未扬：《阮玲玉和刘景桂》，载《北调》1935年第1卷第4期。

[3] 《刘景桂案判决后感言》，载《北方公论》1935年第95期。

[4] 《论评选辑：刘景桂杀人案判决》，载《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17期。

[5] 《祸首逯明》，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3月17日，第6版。

[6] 梦薇：《谈滕爽事件》，载《北洋画报》1935年第25卷第1223期。

[7] 北平妇女会：《为刘滕事件宣言 不要只看到当事人的是非 应对事件起因有正当认识（下）》，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9日，第6版。



过度包容、<sup>[1]</sup>封建思想残余,<sup>[2]</sup>以及妇女运动如何开展等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sup>[3]</sup>这些评论性的、描述性的报道与文章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与这种众说纷纭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职业法律人们相对一致的视角与分析进路。

#### 四、职业法律人之评述

职业法律人们的评论性文章之所以独特,一方面是其问题意识上与大众相异,另一方面则是其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使用的论证技术也与多数媒体大相径庭。在公共媒体聚焦于案件进展和三位当事人的过去经历和个人生活时,职业法律人们多遵循法教义学的思路,从案件事实出发,对照法条的构成要件展开论述。

总的来说,职业法律人们对此案的分析,围绕着两个当事人——刘景桂和逯明——展开。他们会较为密集地讨论“司法独立与审判的公正性”“刘景桂是否成罪”“逯明是否成罪”“判断成罪的标准(即今人所谓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合理”等议题,而在每个议题上都有突出的法教义学色彩。接下来,我将就这几个问题,分别介绍职业法律人的观点与论证方式。

##### (一) 对审判公正和司法中立的追求

这种不同,首先可以从“如何评价审判的公正性”这一问题上看出。总的来说,媒体们时常提出“希望重惩逯明”“恳请轻判刘景桂”等主张,<sup>[4]</sup>并认为这些主张得到实现才是公正的审判。可见,在许多公共媒体看来,实体正义才是评价审判公正性的标准。而职业法律人则看法不同:刘景桂案判决后,《清华周刊》刊载法学学者燕树棠之文,表示了对时人“不知尊重法律之独立,而法院亦缺乏

自尊”的批评。<sup>[5]</sup>

燕树棠于1920年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J.S.D.),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系任教。<sup>[6]</sup>在燕树棠眼中,司法独立应当受到尊重,因此在刑事案件判决前,人们不应当对此大加评论,更不应群情激愤,对法院表示威胁之意思。当人群涌入法院观看庭审以至于法庭秩序严重混乱时,法院应采取手段确保司法独立,并维护法庭尊严。否则就会出现本案这样的坏先例——“读一读第一检察官之起诉书及法官判决书,就可以看出他们不自由的心理状态”。

这样的隐忧也与其他职业法律人所撰之文遥相呼应。一位笔名为“不平”的作者(“不平”其人之所以可称为职业法律人,可以参见其于其他报刊上参与写作的法律相关文章。<sup>[7]</sup>)便在《时事研究(上海)》中撰文云,<sup>[8]</sup>“我们一方面赞誉舆论功用的伟大,同时却不能不担忧司法独立精神的破坏”。总之,在评价审判的公正性时,职业法律人多立足于“司法独立是否得到实现”这一更具程序色彩的判断标准,而大众媒体则相反。

##### (二) 刘景桂有罪:“司法三段论”的法律技术

对刘景桂本人行为的分析,聚焦于其杀人罪成立与否这一教义学问题上。

这类分析的典例,便是王觐在《法律评论(北京)》上发表的文章。<sup>[9]</sup>王觐是民国时期的知名刑法学者,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师从日本法学家星野英一。<sup>[10]</sup>回国后,王觐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高校的法学教师,著有《中华刑法论》

[1] 筱萍:《读“北平市妇女会对滕刘惨案宣言”后》,载《正中》1935年第1卷第11期。

[2] 凤兮:《刘景桂杀人于阮玲玉自杀》,载《妇女共鸣》1935年第4卷第4期。

[3] 罗琼:《刘逯情杀案的总检讨》,载《华年》1935年第4卷第20期。

[4] 《妇女会主张重惩逯明》,载《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3月28日,第八版。

[5] 燕树棠:《清华论坛:北平滕爽情杀案与社会问题》,载《清华周刊》1935年第43卷第4期,第4页。

[6] 赖伟:《燕树棠社会学思想论略》,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期。

[7] 不平、琴、非尘:《法律顾问》,载《中华周报(北京)》1945年第2卷第34期,第15页。

[8] 不平:《逯刘情变案的上诉》,载《时事研究(上海)》1935年第1卷第5期,第1页。

[9] 王觐:《我对于刘逯案之判决书一点意见(未完)》,载《法律评论(北京)》1935年第12卷第28期,第1页。

[10] 梁根林、何慧新:《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上)》,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等作品。<sup>[1]</sup>学界通常认为他在刑法学理论上支持主观主义，是目的刑论者。

王觐之文在刘景桂案初审判决书的基础上展开。在摘录了判决书事实部分后，王觐分别就刘景桂是否涉嫌当时刑法的第二百八十四条预谋杀入罪、第三百二十条无故侵入他人住宅罪做了介绍，<sup>[2]</sup>同时讨论了此案量刑应当据何情节而定。其论证如下。王觐将文章分为“事实”“我见”“法院判决”“评论”四个部分。在前两个部分里，王觐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案例分析，后半部分则与法院判决进行对话。这一谋篇布局本身就有着三段论的色彩：大前提（事实）先行，并在随后每个的罪名讨论中反复回溯事实，分别节选对应的大前提。而在随后的事实部分里，王觐依序做了以下四点评述。

首先，刘景桂构成了《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第一项第一款的预谋杀入罪。因为刘景桂购买了枪支，计划好了混入志成中学的方式，并开七枪杀死滕爽，成立预谋杀入罪。

其次，刘景桂还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条第一项的无故侵入他人住宅罪。刘景桂虽然似乎是在滕爽的许可下进门，但实际上她假冒李振华的名义求见滕爽，以詐欺的方式让人同意进入住宅。滕爽的承诺属于有瑕疵的承诺，视为没有做出，因此仍然成立本罪。

然后，刘景桂买了手枪杀人，违反了《军用枪炮取缔条例》第一条第一项，也是违法行为。

最后，在列举了这三项违法犯罪行为后王觐就对本案的罪数问题下了个结论。他认为，购买枪支与非法侵入住宅，均系预谋杀入人的手段行为，因此应当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从一重罪处断。

除持枪外，王觐论证上述情节均是事实先行，再谈构成要件，最后以“成立/不成立罪名”作结；这种写法是典型的“司法三段论”式的分析。

在细节上，王觐的教义学思想更有体现。一方面，教义学的完整性促使王觐批评法院没有提及许多在法理上同样重要的问题。例如，刘景桂购买并持有枪支是否构成其他犯罪？这种违法行为，应当与本案的预谋杀入行为数罪并罚，还是将购买、持有枪支视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杀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sup>[3]</sup>这些问题，都是在教义学基础上与法院判决进行对话。

另一方面，教义学思路也影响了王觐对一些与社会现实、社会观念相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法院在判决书中声称刘景桂“情状可悯”，并对其降低了刑罚。这样一个相对模糊、教义分析有难度的法条迫使王觐跳出单纯的内部视角，简要分析了“刘景桂到底是不是情状可悯”。但即便是带有外部视角色彩的分析，王觐也尽可能采用教义学的方法，通过指出“刑法以消灭犯罪减少犯罪为目的”，王觐得出结论，认为法院的从宽判决“诚不知其何谓”。<sup>[4]</sup>而这些观点，也与他一直以来在刑法学上的立场相同；<sup>[5]</sup>在其他的作品里，王觐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总之，王觐之文的特色不仅在于“引用法条对案件进行评述”，更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以判决书之事实为论证前提，事实先行，分析在后；（2）分析时引用法条，同时就分析法条适用的构成要件及其该当性；（3）与判决书进行教义学而非情感、道德、价值上的对话，情感、道德、价值在对话中占比较低，且这种外部视角的评述也具有鲜明的教义学色彩。这样的特点，在后续许多职业法律人写作的相关文章中，会一再出现。

同时，在这一议题上，知名律师江庸<sup>[6]</sup>也发表评论，支持对刘景桂判处更高的刑罚。他基于法条规定认为，根据当时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刘景桂这样“杀人而出于预谋”的做法，“应处唯一死刑”。法院的做法于法无据，处刑“失于过轻”。因此，本案的检察官如果不就此上诉，“我国之检察制度，亦真可以废矣”。<sup>[7]</sup>尽管这篇文章还引述了《大公报》的有关社论以说明“一般社会之心

[1]《本校刑法教授王觐先生著中华刑律论总则中卷业已出版》，载《平大周刊》1927年北京平民大学校五周年纪念增刊，第41页。

[2]王觐：《我对于刘遑案之判决书一点意见（未完）》，载《法律评论（北京）》1935年第12卷第28期，第3页。

[3]同上注第5页。

[4]同上注第6页。

[5]王觐：《中华刑法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1页。

[6]《遑明出狱，昨日取保开释，律师江庸发表意见》，载《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5月4日，第8版。

[7]江庸：《为刘景桂谋杀案正告检察官》，载《法律评论（北京）》1935年第12卷第27期，第1-2页。

理”，但整体立论的基础仍然是法律条文，视角与前述王觐之文接近。

当然，并非所有的职业法律人都通过单纯的司法三段论进行分析。事实上，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并不是纯粹的实定法解释，更涉及刑法哲学的问题。因此，尽管用词与今日刑法学者不同，但作者易逢春在《刘景桂案与法律底哲学基础》一文中便从哲学视角出发，主张犯罪构成理论应主客观相统一，而不能单纯从行为人的主观层面认定罪名或一味依靠客观层面定罪。<sup>[1]</sup>易逢春认为，刘景桂案的初审具有明显的“机械的物质论”色彩。这一思想让法院“注重行为，不注重动机；而在行为上则注重直接的、当下的和显露的行为，不注重间接的、渊源的和潜伏的行为”。这种“机械的物质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死板地按照法律处罚了杀人的刘景桂，却不处罚（在他看来）教唆了刘景桂杀人的逯明。当然，他也提到，如果单纯依靠“注重行为之动机的观念论”，“那也不对”。所以要主客观相结合，“使法律顾及整个和全面的事实”。

这样的发言虽然并没有直接对刘景桂案的判决作出评价，但通过对小前提所涉及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批判，易逢春间接表达了他的不满。我们可以说，在几篇职业法律人的评述中，“司法三段论”的推理方式是虽未明言但显而易见的。从这几篇文章来看，这也是职业法律人的共识所在。

### （三）逯明无罪：一个教义学而非道德哲学的评价

对逯明行为的教义学分析，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分析逯明是否触犯了杀人罪（以及杀人罪教唆犯）；另一类则探讨逯明是否有“妨害风化”方面的犯罪。这两类文章的作者都采取了较为接近的法律技术。尽管司法三段论的使用并不突出，但对法理的分析仍然多从职业法律人的内部视角出发。

前者以郑家祚（法学学者，著有《婚姻法论》<sup>[2]</sup>）所作的两篇文章最为典型。这两篇文章思路明确，篇幅也相对较短，逻辑链条清爽利落，便是“法条—事实—定罪”。文中，郑家祚着重讨论了逯明是否与刘景桂成立共同犯罪，分析了其是否构成刘景桂杀人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在第一篇文的开篇，郑家祚便列明了教唆犯定罪量刑的法条（“刑法第廿九条”“刑法第三十条”），作为自己讨论的基础，<sup>[3]</sup>并强调了自己“法定主义”的立场。彼时，案件判决书尚未公布，郑家祚只能

就起诉书中所列的事实简要谈论自己的看法。但他的确严守了自己的立场，对事实的分析仅做教义学上的推演，考察逯明是否有帮助、教唆刘景桂的行为和动机。郑家祚坦承逯明的行为极为恶劣，事实上也引起了刘景桂的杀人行为，但“法律与道德，界限攸明，未可混淆”，“道德上所认为恶者，未必概属犯罪”。在这样一段与法本体论紧密相连的论证里，他也不忘为自己找到实定法依据——“盖行为之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刑法第一条）”。

这样清晰明快的逻辑在判决书公布后的第二篇文章中更为凸显。<sup>[4]</sup>在这篇一个月后发表的文章里，郑家祚虽然用了八成的篇幅分析案件事实，但实际上，郑家祚的分析是有明确指向的。他认为，逯明之所以做出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是因为他有“‘鱼亦欲，熊掌亦欲’之妄想”，想实现他“兼娶”的欲望。乍一看，郑文似乎是在编排八卦，与其他媒体评述并无二致；但事实上，他希望分析逯明的行为客观上有没有教唆刘景桂，以及主观上有没有教唆刘景桂的故意。而通过事实重述，郑家祚想说明的是：逯明对二女有兼娶之意，并无不睦，因此不可能教唆、帮助刘景桂去杀害滕爽——不然还怎么“兼娶”呢？所以，作为“司职之吏”的法官，应当“援律判罪”“根据确凿证据”“不能因逯之行为卑鄙，而加以罪刑也”。

可见，郑文虽与前引王觐之文相比，在法条分析上占比少了一些，但其事实陈述并不是为了报道，也不是为了挖掘当事人的经历。相反，这些事实最终服务于罪行认定——即逯明是否成立《刑法》所规定的帮助犯或教唆犯。在问题选取上，郑王二人并无显著差别；在论述方式上，也是在严格讨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能与法条规定相对应。而且更为统一的是，情感和公众观念在这三篇文章中几乎都是息声的。

而在后一类分析中，王觐仍然有极具代表性的

[1] 易逢春：《刘景桂案与法律底哲学基础》，载《研究与批判》1935年第1卷第3期。

[2] 郑家祚：《婚姻法论》，民报馆1934年版。

[3] 郑家祚：《逯明有杀人罪责乎》，载《民报》1936年6月25日，第9版。

[4] 郑家祚：《逯明有教唆杀人罪乎》，载《民报》1936年7月23日，第9版。



文章产出。在发表于《法律评论（北京）》的另一篇文章里，王觐写作了一篇长达10页的文章，论述遯明是否有妨害风化的犯罪行为。<sup>[1]</sup>与他讨论刘景桂杀人的文章类似，本文依旧分为“事实”“我见”“法院判决”“评论”四个部分。而文中讨论的“妨害风化犯罪”，主要指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所规定的“诈奸罪”（也称为诱奸罪，因为法条中并未规定官方罪名。<sup>[2]</sup>此外，二百四十四条系王觐所引之法条，根据判决书，审判时诱奸罪的现行法条为二百二十九条，二百四十四条为旧律）。

在内容上，王觐延续了在前文中使用的“司法三段论”写法。文章仍然以判决书中认定的案件事实开篇，随后开始对所涉的诱奸罪法条进行拆解，分析出该罪的六个构成要件。随后，其按照司法三段论的一般推理方式，将案件事实与此一一对应，认为刘景桂“不因遯明求欢而发生错误”，所以本案遯明的行为不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事实上六个要件里只有一点与法条符合。<sup>[3]</sup>在介绍了法院判决后，王觐也分别从立法论<sup>[4]</sup>和教义学<sup>[5]</sup>出发与法院判决进行了对话。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王觐的结论，在行文方式和问题选择上，王觐和郑家祚的文章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当然，职业法律人们对道德视角的回避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于尚未从事法律实践的法学生而言，道德判断仍然有其重要性。《大学新闻（北平）》就记载了趣事一则：当张讲师（一位有多年实务和审判经历的法律工作者）提出，刘景桂的行为不算自首，且遯明的行为不应（此处的不应，意为“不能”）受到现行法律制裁时，学生们“都同情刘景桂而攻击遯明”。<sup>[6]</sup>尽管张讲师在法理上说服了讲台下的法学生，但法学生们真实的情感却未因法律的确信而消弭。尽管这样带有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的职业法律人发言罕见于刊登的报纸，但这样的反例也提示着我们：像司法三段论这样的法律技术是习得的而不是环境自然孕育的，因此职业法律人们共享与公众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 （四）小结

本部分考察了公共领域的职业法律人们是如何看待刘景桂案及其各方当事人的。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共同点。

第一，他们共同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十分关切，相比于公众媒体仅关心当事人“是否犯罪”“是否应该负责”的切入点，职业法律人们同时对“审判

是否公正”“审判背后的法哲学基础是否正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二，职业法律人对法律问题的评价更受到法教义学方法论的影响，情感、公众观念较为淡化。在“是否犯罪”这样法学色彩明显的问题上，职业法律人们发表观点的方式也与公众媒体并不相同——公众媒体更倾向于用道德论证取代纯粹的法律论证，而职业法律人们的评述往往更加立足法条。

第三，职业法律人们的对话对象也与公众媒体有所区别。公众媒体们通常面向大众（很多时候是面向妇女）来作文，因此情感更为凸显，用语相对激昂，结尾常有呼告、劝导之意；而职业法律人们的对话对象则并非普罗大众，部分职业法律人选择对判决（如王觐）和上诉状作出回应（如江庸），即使是那些对话对象并不明显的文章，也情感色彩较淡，并不是为了劝导读者、引导普罗大众而写。

当然，并非所有职业法律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在教义学上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各人之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更可能天差地别。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提示我们，同为职业法律人，不同人之间（无论是教义学上还是道德观上）仍有诸多变异。本部分无意暗示职业法律人是一个均质的群体。相反，笔者仅意在说明：在问题选取、说理方式、受众面向方面，职业法律人们通常共享类似的偏好——他们往往侧重于分析事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而在分析问题时注重从实定法出发、兼及实定法背后的法理依据，且更愿意与其他职业法律人而非普罗大众进行对话。这些特点，也在本案审判的各个阶段都有所体现。

[1] 王觐：《我对于刘遯案之判决书一点意见（续十二卷二八期）》，载《法律评论（北京）》1935年第12卷第30期。

[2] 赵秉志、陈志军编：《中国近代刑法立法文献汇编》，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14页。

[3] 王觐：《我对于刘遯案之判决书一点意见（续十二卷二八期）》，载《法律评论（北京）》1935年第12卷第30期，第3页。

[4] 同上注第8页。

[5] 同上注第6页。

[6] 《朝阳课堂上的趣剧：刑诉讲师大谈刘滕案件，他说刘景桂之该死却引起同学反对》，载《大学新闻（北平）》1935年第3卷第6期。



## 五、司法审判中的刘景桂案

上文介绍了职业法律人们对此案的评述。尽管职业法律人的发言并不总能为司法实务所接受,但作为同一时代的职业法律人,他们依然共享类似的法律文化。刘景桂案历经三次审判(三次),每次审判均有控辩审三方涉及,其中辩方更是有两名嫌疑人、三名辩护人。本部分中,笔者将择要介绍本案司法审判中职业法律人们的行为与写作。对审判的分析,可以从庭审流程、庭审内容和文书写作三者来考量。其中,庭审流程着重总结本案庭审的各个阶段为何,以及是否与当时《刑事诉讼法》之规定相吻合;庭审内容主要提取各方在庭审中发问、作答的重点问题,考察其问答攻守是否与法相关;文书写作则重在分析不同司法文书的行文格式与实质内容,与评论性文章形成对照。总之,对这三者的描述都意在归纳职业法律人们使用的法律技术。

### (一) 严谨有序的庭审流程

提及司法审判,自然绕不开庭审。作为司法过程中最具戏剧性的场所,法庭上的各方如何向公众展示自己,实在是绕不开的。虽然本案历经三次审判,但根据1934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审为书面审而非庭审。<sup>[1]</sup>因此,本案中共有两场庭审。

第一审于北平地方法院进行,其案由为“刘景桂杀人”“逯明妨害风化”,<sup>[2]</sup>后续的交锋也围绕这两点展开。根据案卷,开庭前法院便依据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向刘景桂的辩护律师刘煌发送了《开庭日期律师通知书》以通知其到庭。<sup>[3]</sup>而在正式开庭后,先由书记宣告本案案由(依据为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再由推事询问刘景桂的“姓名,籍贯,年龄,住址,职业”(依据为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并在逯明身上重复一轮。<sup>[4]</sup>在陈述完基本信息后,检方先应推事(即司法官)之要求陈述起诉要旨(依据为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再由法官进行法庭调查,查明证据与案情(依据为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庭审的实质内容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我们继续考察庭审程序。法庭调查完毕后,推事依次请检察官和辩护人展开辩论(依据为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辩论后准备宣判。

宣判并非当日做出。本案第一审开庭于1935年4月22日,<sup>[5]</sup>辩论终结于4月23日,而最终宣判时间为4月30日。<sup>[6]</sup>巧合的是,这正好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的最长期限。该条规定,“宣示判决应自辩论终结之日起七日内为之”。

几个月后,第二审于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进行。根据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之规定,“第二审之审判,除本章有特别规定外,准用第一审审判之规定”。因此按照法律规定,第二审的流程应当与第一审大同小异。从案卷来看,事实也正是如此。首先仍然是“书记官起立报告现在调查刘景桂预谋杀人及逯明妨害风化被告上诉一案”,传唤刘景桂到庭。然后是推事询问“姓名,年岁,籍,住,职”,并核实刘景桂的其他信息(如是否“有病”,是否已读检察官的上诉理由书)。同样的流程在传唤逯明后重复一遍。<sup>[7]</sup>

为了行文不致过于重复,第二审中与第一审重复的内容本部分便不再赘述了。但第二审中仍然有一些小细节,暗示了本案庭审的严谨性。庭审中,推事问道,“去年十月廿五日你给了刘景桂一封信,

[1] 1935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第三审法院之判决不经言词辩论为之。但法院认为有必要者,得命辩论”。

[2] 《封面》,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页。

[3] 《开庭日期律师通知书》,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25页。

[4] 《言词辩论笔录(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廿三日上午九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29页。

[5] 《刑事审诉记录》,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7页。

[6] 《宣判笔录(中华民国廿四年六月廿七日下午三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36页。

[7] 《调查笔录》,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88-190页。

上面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推事“交信看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把信交给逵明”的行为，却也是当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法律规定。该条称，“卷宗内之笔录及其他文书可为证据者，应向被告宣读或告以要旨。前项文书有关风化、公安或有毁损他人名誉之处者，应交被告阅览，不得宣读”。

另一处有趣的细节则是，第二审延续时间较长，几次法庭调查期间间隔甚久。因此，每次法庭开始调查前，都会重新宣读案由，核实案件当事人身份。这样的情况，在1935年7月8日，<sup>[1]</sup>1935年8月29日<sup>[2]</sup>等几次法庭调查笔录中都能看出。这一做法看似冗余，其实也是因为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如下次开庭因事故间隔至十五日以上者，应更新审判程式”。从以上的一些细节来看，在本案审判中，彼时《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流程得到了较为严格的贯彻，因此可以称之为严谨有序了。

## （二）依法展开的庭审内容

程序的严谨并不影响我们继续考察庭审辩论的实质内容。如前所述，彼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先调查证据，后进行辩论”的庭审流程。因此本案第一审法庭调查中，法官便先行向刘景桂和逵明二人发问，这些问题包括例如刘景桂是否杀人、如何以李振华的名义混入志成中学、杀人过程如何、开枪后受害人滕爽情况如何等。这些问题并不纯粹是为了还原案发过程。一方面，对“事实”的追问其实是在验证本案证据（例如案前刘景桂的口供）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另一方面，推事的发问也是在查探刘景桂的主观故意。后者例如，庭审中推事问刘景桂“你是什么时候起意杀滕爽的”，

刘景桂具答曰：“今年三月八日我将手枪买到手里，本意原想去打逵明，但后来改变了想法，起意去打滕爽。”<sup>[3]</sup>类似的主客观兼顾的问答方式，也可以见诸推事对逵明的问讯。推事先问道“你与刘景桂是何时产生奸情的”，得知回答后又问“通奸究竟何人先起意的”。这两句询问，一方面意在确定二人间存在“奸情”，另一方面则是考察逵明是否有诈奸的主观故意。

可见，推事的发问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目的便是将案件事实与法律条文相对应，为后续的控告做铺垫。但法庭从来不只是推事的独角戏，在法庭调查环节结束后，辩论环节中控辩双方都有同样有趣的做法。刘景桂的辩护律师刘煌在第一审答辩时，第一句话便是“本案被告逵明欺负女人未免太甚”。<sup>[4]</sup>这一看似注重情感与人情的表达，实际上仍然是为后续的法律论证服务。以情开头的刘煌律师随后便引用彼时《刑法》第七十七条和七十八条，称刘景桂“其情可悯，都应减刑”。可见，单纯的情感、人情并不是刘律师辩护的策略，诉诸法律的、在法律上有意义的“情”才是刘律师希望展开的。整体来说，刘律师的辩护也主要围绕《刑法》中可以减轻量刑的情节而做。

第二审审理延续了第一审的发问方式与基调。虽然第二审上诉人包括受害者滕爽的亲属滕树本，<sup>[5]</sup>但程序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实质内容。在第一次法庭调查中，推事便问刘景桂在致信逵明时为何提到了一起西方文化“沙罗美杀约翰”情杀事件，并似乎并不以此为恶（很显然，法官希望查明刘景桂是否早有杀人预谋）。<sup>[6]</sup>而在随后的第三次法庭调查中，法官又一次询问了刘景桂“为什么想杀他死”，刘

[1] 《调查笔录（民廿四年七月八日上午八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279页。

[2] 《言词辩论笔录（民廿四年八月九日上午七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15页。

[3] 《言词辩论笔录（中华民国廿四年四月廿三日上午九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34页。

[4] 《“刘遑案”刘煌律师陈述》，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80页。

[5] 《滕树本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51页。

[6] 《调查笔录（中华民国廿四年六月七日上午八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206-207页。

景桂答曰：“买枪想杀逯明，彼时不能与逯明见面。”所以慢慢变得“想杀滕爽了”。<sup>[1]</sup>在对逯明妨害风化部分的考察中，推事则细致地询问了刘景桂与逯明发生性关系时的精神状况。推事问了刘景桂“一起睡觉你愿意不愿意”“他奸你时你知道不知道”等几个问题，并随后询问逯明对刘景桂的这番情况是否知情。<sup>[2]</sup>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庭审中的各方皆重视法条法理，尽管内容看起来是纯粹的事实交锋，但其争议核心乃是事实背后的法律规定是否有利于己方。而这样庭审的特色，也能见诸各方写作的文书中。

### （三）“奉法为尊”的司法文书

尽管载体不同，但无论是文书还是庭审，其参与人仍然基本相同，因此控辩审三方的文书也继承了前述的共性。由于本案涉及的文书较多，我将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进行说理的部分进行阐述。

我们先从文书的格式谈起。欲言文书，必道判决书。本案的三份判决书在形式上有着统一的写作格式，写作顺序均为“身份信息一案由一主文一事实一理由一署名”。<sup>[3]</sup>统一形式之下的内容也十分有趣。经历庭审，同时处理两名被告的二审判决书内容丰富程度是三篇判决书之最，因此审判方的分析特色，也集中体现于此。<sup>[4]</sup>二审判决在列明了法定事项后（身份信息至主文部分），先讲事实，后讲此案中二位当事人的案由（一为杀人，一为妨害风化）并无牵连关系，本应分案审理，只是因为起诉时已经并案处理，所以一并写作了判决书。这句话虽然与案情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刑事司法程序（即这一情境下并案处理的必要性）的重视已经

得以让我们管窥民国司法审判的程序严密，这是程序上的“奉法为尊”。

格式之外，实质内容也值得我们注意。在实体法论证部分，针对刘景桂，<sup>[5]</sup>法官认为原判的量刑过轻，应当“依旧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一项第一款论，该上诉人预谋杀人罪行”。而做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法官一一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进行了比对。例如，法官先列举了刘景桂的呈堂供正证，指出刘景桂声称自己想杀逯明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二人“晤面机会甚多，而杀人手段又非即须枪杀”，如果刘景桂“果有杀害逯明决心，何以未见其实施？”因此，法官认定刘景桂确实预谋杀害了滕爽，“想杀逯明”的说法只是“饰词规避避难采信”。与此略有不同，法官在对逯明部分的判决里采取了先写法条，后写结论的方式。<sup>[6]</sup>法官“查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旧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诈奸罪”，指出该罪“须告诉乃论之罪”，而且这个告诉之人“知悉犯人之日起于六月内为之”。随后，法官跳过了对逯明是否有诈奸行为的实质判断，直接依据刑法亲告罪的总则规定，提出逯明的情节“不在本院予以审判之列，自无论追究之余地”。<sup>[7]</sup>最后，在列举完全部判决书所涉法条后，法官结束了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判决书。

“奉法为尊”并不是本案判决书的专利。尽管与整齐划一的判决书写作格式相比，律师们的文书更有自由度一些，但在实质内容上，律师们与判决书不谋而合，本文以两位辩护律师所作的辩护意见书为例。

在一审期间，逯明的辩护律师梁柱律师和王振华律师便共同就“逯明妨害风化罪”给出了辩护书。这封辩护意见书严守司法三段论之论证方式，将辩

[1] 《言词辩论笔录（民廿四年八月九日上午七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20-421页。

[2] 同上注第468页。

[3] 《平情杀案判决书》，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5月4日，第十版。

[4] 《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刑事判决》，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533-540页。

[5] 《北平桃色惨案上诉判决书原文（上），刘景桂仍处无期徒刑，逯明公诉部份不受理》，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9月29日，第四版。

[6] 《北平桃色惨案上诉判决书原文，刘景桂改判无期徒刑，逯明公诉部份不受理》，载《时事新报（上海）》1935年9月30日，第3版。

[7] 《刘景桂案判决书逯明公诉部分不受理原因》，载《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26日，第6版。



护意见书分成了“事实之认定”“法条之解释”和“逕明之行为不构成犯罪”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事实）、小前提（法条）和结论（成罪与否）。<sup>[1]</sup>这样的写作手法是律师有意为之，因为梁柱律师和王振华律师还共同就刘景桂杀人行为提交了辩护意见书（注意，刘景桂并非二位律师的委托人），而给刘景桂写的这份辩护意见书则没有明显的分段分点，只是平铺直叙，意在为逕明的辩护铺路。<sup>[2]</sup>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份辩护意见书的对比中看出，在律师们希望用心、专业地提供辩护时，司法三段论的辩护意见书写作方式是他们更倾向于采纳的。

而司法文书的内容也别有趣味。我们可以大致将律师们的辩护意见分为事实辩护和法律辩护。其中梁柱律师在第二审提交的辩护意见书便是事实辩护的典范。这篇辩护意见书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梁律师着重分析了“证据的有无”和“证据的证明力”两个问题。可见，本案的律师已经明了，法律事实是有证据支撑的事实，而举证质证之意并不在“证据”自身争辩，更在于“证据”所代表的事实是否得以成立。梁律师的辩护词向我们展示了当时部分律师的法律意识。在该意见书中，梁柱律师开篇便声明，<sup>[3]</sup>辩护状将逐条对检察官起诉的诈奸罪和强奸罪作出回应。针对诈奸罪指控，梁律师表示他在庭审中已有详细解说；<sup>[4]</sup>针对强奸罪指控，梁律师认为第二审检察官罔顾第一审中各方的言词证据（“仅于初审辩论时供称饮了一杯”），贸然提起对逕明的强奸罪指控，这是与事实不符的。随后，梁律师又从案件时间、空间，实施强奸行为的必要性方面，分别说明逕明既没有强奸的可能，也没有强奸的必要。总之，在证据问题上做文章，同时通过证据说明事实如何，是梁律师的辩护思路，也是梁律师法律意识的体现。

与梁律师侧重事实辩护不同，刘景桂的辩护人刘煌律师更注重法律上的辩护。<sup>[5]</sup>第二审的争议焦点依然是刘景桂是否“情状可悯”，是否有自首情节。刘律师一方面援引刑法法条，指出刑法修改后，自首的条件与旧刑法“须向公务员自首者要件宽泛”，因此被告刘景桂向志成中学校役表示“赴公安局打官司”，也是自首表示的一种。刘律师甚至“查自首之立法政策，渊源于中华法系犯人之自白悔过受刑”，所以刘景桂向

校役一再表示，就是自首的一种，应当减刑。另一方面，刘律师还援引多起当时最高法院的判例（如“二十一年最高法院上字三九零号判例”），来辅助说明刘景桂情状可悯。事实上，“情状可悯”并没有严格的教义学解释，因此刘律师诉诸并不完全是法律渊源的判例也是“找法”的一部分。

无论这几位律师的辩护意见是否成立，二位律师均没有通过煽情等法律无关的方式提出辩护。对于最可能涉及“情”的刘景桂，刘律师采用判例来辅助说理；对于逕明的强奸嫌疑，梁律师不仅以逕明和刘景桂的感情为据，更给出了事实上不可能的理由。当然，理由是否被认可，是法院司法审判的责任；律师的说理方式本身就具有单独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文书上还是法庭上，控辩审三方均“奉法为尊”，仅有的涉及情状的部分，也是为了适配“情状可悯”而作，本质上仍然是法律辩护的一部分。司法审判中的诸位职业法律人在这方面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 六、清代司法传统的断裂与司法近代化

在此前部分里，我们已经回顾了刘案中媒体视角与职业法律人视角存在的诸多差异，以及职业法律人彼此之间的共性。如果我们同意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奥莫亨德罗（John Omohundro）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群人通过习得，对所

[1] 《辩护意见书：逕明妨害风化罪》，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17-130页。

[2] 《辩护意见书：刘景桂杀人一案》，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105-116页。

[3] 《梁柱律师为逕明亦提出辩护书，反驳初审上诉理由，逕表示愿在监习画》，载《益世报（天津版）》1935年9月2日，第8版。

[4] 《言词辩论笔录（民廿四年八月九日上午七时）》，载《北平地方法院刑事判决案卷》第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469页。

[5] 刘煌律师：《为刘景桂杀人案辩护状之原文》，载《益世报》1935年9月1日，第8版。

作所为和每件事物的意义共有的认识”<sup>[1]</sup>——那么,这些职业法律人无疑共享同一套法律文化,他们共同在法学院/系学习法学知识,而对案件分析有着相似的方法论,并会得出大同小异的分析结果。这种法律文化,被部分学者称为“内面法律文化”(internal legal culture),意指职业法律人内部对法律的认识。<sup>[2]</sup>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文化是历史的而非天然的产物,对文化的理解也应当将文化置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进行。<sup>[3]</sup>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作为专职诉讼人员的律师、专掌司法权的法官,以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的刑事诉讼构造,在晚清以前是不成体系的。晚清前后,中国刑事诉讼的程序法与实体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诚如黄宗智所言,“司法实践既不同于成文法,也不同于民间习俗”。<sup>[4]</sup>法律实践和成文法典之间常有背离,因此上述立法层面、制度层面的诸多变化并不天然意味着司法审判的断裂——事实上,已经有学者通过研究四川省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指出民国时期地方上基层司法实践与中央政府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其认为,“虽然现代司法规则的制定对司法官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在形式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司法的一些外在特征,但在基层司法的核心理念上,传统中国司法模式仍以旧瓶装新酒的形式发挥作用”。<sup>[5]</sup>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清代的司法传统在新立法、新社会状况面前,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新的法律文化乃至司法传统的诞生呢?正是在讨论这些问

题时,对比清代司法传统与新兴法律文化成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 (一)“情、理、法”的司法传统

广义来说,晚清的司法传统体现在审判里诸多的惯习中。无论是案件分类上采取“重情、细事”的二分法,<sup>[6]</sup>案件审断上“告则准,准不一定理,理不一定准(审),审不一定断,断不一定依律”这一规律<sup>[7]</sup>,都可以归属到广义的“司法传统”这一概念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重情/细事”,<sup>[8]</sup>还是“告则准,准不一定理,理不一定准(审),审不一定断,断不一定依律”的审断规律,都没有(也不太可能有)统一的、明确的法律规定,例如国家法律未对“重情/细事”这一二元案件分类方式明确命名,因此在不同场合其表述时有差异;而后者审断规律则更是只能从学者们对司法档案中判例的总结才能看出。学生窃以为,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司法传统中,荦荦大端者系“情、理、法”判案方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综合学界对“情、理、法”判案方式的探讨来看,这一判案方式可以体现在晚清各级、各类审判之中。滋贺秀三就曾撰文指出,“情、理、法”三者在清代官员处理公务时几句是相提并论的,而无论审判的案件是关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情、理、法三者都是司法官加以斟酌的要素。<sup>[9]</sup>

如果说这样的表述相对笼统,我们可以对清代司法案件进行类型化,分类讨论推理方式。由于清代并没有明显的民刑部门法之分,我们可以大致将晚清司法审理的案件分为“命盗重案”和“州县自

[1] John T Omohundro, *Thinking Like An Anthropologist.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McGraw-Hill, 2007, p.26.

[2] Lawrence Friedman, *The Leg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223-268.

[3]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载《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93页。

[4] 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页。

[5] 刘昕杰:《民法典如何实现:民国新繁县司法实践中的权利与习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6] [日]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法”的理解》,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 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60页。

[8] 邓建鹏:《词讼与案件:清代的诉讼分类及其实践》,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

[9] [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理案件”。<sup>[1]</sup>通过对黄岩档案这一州县司法档案的分析,学者研究认为,“黄岩知县针对民事案件甚至刑事重案很少引用法律为裁判依据”。诚然,在个别案例中黄岩知县查照律例进行了裁判,但这些案例中并不直接依据律例做出裁判,摘引律例只是知县威胁当事人接受裁判的方式。<sup>[2]</sup>对此,有学者评价云:“清代官员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依律例审理,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与民间习惯存在较大差异的时候。”<sup>[3]</sup>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其他研究上。有学者引用清代《樊山政书》中的批词说明,立案审查时审案的地方官员就已经以“情理”作为自己受理与不受理案件的理由。<sup>[4]</sup>除此之外,对《官箴书集成》<sup>[5]</sup>《判语录存》<sup>[6]</sup>的研究也呈现出相近的现象。

“州县自理案件”如此,“命盗重案”也不例外。尽管前引文中,滋贺秀三倾向于认为清代的“命盗重案”有明显的依法审判色彩,<sup>[7]</sup>但已经有学者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挑战,认为清代司法对于“命盗重案”的裁判在类型学意义上不属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相反,当清代司法官员在援引“律例”这一被认为是“法”的依据时,其最终所引用的是“法”背后的“情理”。<sup>[8]</sup>这一说法部分得到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支持。通过对清代刑部发布的《刑案汇览》全编研究,有学者表示“在 9200 余件判例中……几乎每一件在文字表达上都有‘情’或‘理’字,所涉及的情理包罗了清代社会的千态万象”。<sup>[9]</sup>类似的表述,

同样可以见诸对《驳案汇编》等史料的研究。<sup>[10]</sup>

有学者甚至进一步认为,这种将“情、理、法”综合考量的司法传统不是清代特有,更是整个中国传统司法所追求的。<sup>[11]</sup>其认为,传统司法的司法官始终要在“严格执行法律”和“做出公正的、适应现实要求的裁判”之间做到平衡,或者说在“类案正义”和“个案正义”之间取乎中正,而这样的判决也必然需要“合情、合理、合法”。“情、理、法”判案方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学者在当代的司法审判里依旧看到“情、理、法”的影子徘徊在判决书的背后。<sup>[12]</sup>

综上所述,“情、理、法”判案方式是各级、各类晚清时期审判均会遵循、考虑的推理方式,将其视为清代司法传统的代表有合理之处。下文将以此为司法传统之代表,与刘景桂案的司法呈现作对比。

## (二) 职业法律人与司法传统的断裂

正是在与前述司法传统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刘逮情杀案中职业法律人们的不同之处。可以说,无论是律师、检察官、法官还是学者,都与前述的司法传统相去甚远,有着明显割裂。

这里的断裂一方面是形式上的。有学者指出,古代判词的制判者往往采取边叙边议的策略,将案件事实和判决理由合二为一。<sup>[13]</sup>但到了刘景桂案中,这样的特色已经消失殆尽了。刘景桂案的三份判决书均按照“身份信息一案由一主文一事实一理由一署名”的统一格式写作,规范性极强。由于三份判决书分别

[1] [日]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2] 邓建鹏:《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3] 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79 页。

[4] 俞江:《明清州县细故案件审理的法律史重构》,载《历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5] 赵妮妮:《晚清知县对婚姻讼案之审断——晚清四川南部县档案与〈樊山政书〉的互考》,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6 期。

[6] 汪雄涛:《明清判牍中的“情理”》,载《法学评论》2010 年第 1 期。

[7] [日]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 页。

[8] 李栋:《超越“依法裁判”的清代司法》,载《中国法学》2021 年第 4 期。

[9] 陈小洁:《清代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内在价值及现代启示》,载《法学》2016 年第 11 期。

[10] 杜军强:《法律原则、修辞论证与情理——对清代司法判决中“情理”的一种解释》,载《法学论坛》2014 年第 6 期。

[11] 张中秋,潘萍:《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及其实践》,《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78 页。

[12] 张杰:《中国传统情理法的法理重识与现代转化——以〈驳案新编〉为切入点》,《北方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160 页。

[13] 张清:《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3 期。



由三所法院的不同法官写就,我们可以说部分职业法律人已经发展出了不同于清代司法传统的文书写作方式。形式上的割裂还可以从庭审中发现。与清代庭审中时不时见到的当事人依靠声势先声夺人,法官咆哮公堂、却无可奈何无法镇住庭审不同,<sup>[1]</sup>刘景桂案的三次庭审虽然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以至于旁听席上水泄不通,但庭审却依旧按照既定流程进行,两次庭审之间的程序也都符合当时的刑事诉讼法:控辩双方依序提问发言,按律答辩应诉,法官纠问听答。井然有序的庭审,格式严谨的文书,无不在显示着职业法律人们与司法传统之间的断裂。

另一方面,这种差异也并不仅限于形式上。如果说形式上的差异可能由于实定法(如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的变动而产生,那么实质内容上的差异则不属此类。诚然,实定法的变化会影响教义学推理的结论,但结论并不是实质内容的唯一组成部分。事实上,推理过程和对法律渊源的选用同样值得推敲。如前所述,清代判词中法律前提的确定并不是单纯的“找法”,更是需要将找到的法律依据转化为“最终适用的裁判依据”。<sup>[2]</sup>质言之,晚清法律适用的目的在于“情法两平”,因此常用“比附”“类比”等推理技术。反观刘景桂案的判决书、辩护状、起诉书,“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结构才是常态。类似的说理方式也从司法过程中延伸到职业法律人们的文章评述里。职业法律人之文依旧立足实定法来评价案情,选取切入点。“情”似乎被驱逐出了司法领域,留下的只是法言法语。

由此,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便是,这种断裂意味着什么?这种断裂发生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有何呢?

### (三)作为司法近代化先声的“断裂”

总体来说,这种断裂可以被视为“司法近代化”的体现之一。而这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这种割裂令人惊讶。

之所以说这是令人惊讶的,一方面是因为民国时期“司法独立/中立”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就作为一种理念的“司法独立/中立”而言,其于清末民初被引入中国,被当作“救国之因”而不是“治国之果”来对待。<sup>[3]</sup>由于司法独立的基础较为缺失,有学者指出,这种西方化的司法独立的价值取向及其制度功能在近代中国既没有得到充分的理性知识的熏陶,也无法解决政体上的制度性缺损,因此本身就难以实现。<sup>[4]</sup>即使司法制度改革不断,领导层三令五申,司法独立仍然充其量只是一种新理念,“而且这种新的理念尚未取得支配地位”。<sup>[5]</sup>

也许上述“司法难以中立/独立”的大背景仅限于审判领域和制度领域,法学学者似乎不应受到如此影响。然而,现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学教育同样困难重重。民国初年设置的“司法讲习所”(旨在培养司法官人才)多次兴废,最终于1921年停办。尽管1926年北洋政府又设“司法储才馆”以继承司法讲习所之职能,但这种法律职业培训的反复不定本身就暗示着职业法律人群体大有几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意味。<sup>[6]</sup>这样的现象也并不仅出现在司法讲习所这样职业教育为导向的培训机构上,各大高校的法学院系也有难言之隐。部分高校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sup>[7]</sup>而经费充足的高校仍然可能教育质量令人堪忧。例如,1930年代的上海法学院校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律师,不惜通过篡改成绩和刻意提高分数的方式帮助其毕业生获得律师资格,甚至“放弃对培养质量的追求”。<sup>[8]</sup>可见,尽管法学院校已经出现,也有不少学员就读,但教育质量即使在上海这样律师数量全国第一的城市也未必能得到保证。而这些院校还时常面临被污名化的风险,其时便有人认为,这些法政学校培养出了不少品行不端的毕业生或“架词挑讼的律师”,应被撤销。<sup>[9]</sup>

[1] 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

[2] 陈小洁:《中国传统司法判例情理表达的方式——以〈刑案汇览〉中裁判依据的选取为视角》,《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123页。

[3] 喻中:《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4] 韩秀桃:《近代中国对司法独立的价值追求与现实依归》,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5] 郭志祥:《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研究(上)》,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号。

[6] 李启成:《司法讲习所考论——中国近代司法官培训制度的产生》,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

[7] 里赞、刘昕杰:《四川法政学校——中国近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地方实践(1906—1926)》,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8] 沈伟:《民国律师的养成与律师制度的局限——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例》,载《北方法学》2017年第4期。

[9] 尤陈俊:《阴影下的正当性——清末民初的律师职业与律师制度》,载《法学》2012年第12期。

活动于这样法学教育困顿、司法领域难中立的环境中，职业法律人们自然不总是“依法”行事。首先，枉法裁判可能产生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存在的角色转换与利益勾连，这使得法官与律师权力寻租层出不穷；<sup>[1]</sup>其次，“面子和人情”也徘徊在审判背后；<sup>[2]</sup>最后，传统律学依然盛行，近代化的法律人才仍然远远不足。由是观之，刘景桂案中职业法律人们呈现出的新兴法律文化更显得难能可贵了。案件里诉讼话语和法律技术的转变，也许正反映了其时发生在司法场域中的知识转型，<sup>[3]</sup>尽管这一转型较为初步，还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这正印证了诸多学者所描述的民国时期司法近代化面临着与传统价值藕断丝连、难以割舍的困境。<sup>[4]</sup>这也暗示着，刘景桂案所呈现出的“教义凸显，奉法为尊”的司法审判，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完全实现下沉，基层司法仍然有自在的运行逻辑（注意，刘景桂案发生于、审判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

这样并不友好、谈不上独立中立的司法环境，却仍然孕育出了刘景桂案中极具内部视角、奉法为尊的控辩审三方，实属不易。即使刘景桂案的司法审判不足以代表民国时期司法审判的全貌，我们仍然可以说，部分地区的法律语言已经发生了转变，<sup>[5]</sup>共享一套“内面法律文化”的职业法律人群体已经出现。这些，都是司法近代化的先声——尽管近代化的进程因地而异。刘遯情杀案的确提示着我们，在1935年，新兴的法律文化正在诞生，与传统的罅隙已然出现。至于1935年后司法近代化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能得到多少认同，则需要更细致的研究才能查明了。

## 七、结论

一起法律上并不复杂、甚至十分简单的情杀案件，却在1935年的北平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随后的十

年里余波荡荡。显然，仅从教义学上做案例分析是不够的——围绕着此案，公众媒体各抒己见，给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评论。但与公众媒体百花齐放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职业法律人们的特殊性：公共领域的职业法律人们在问题选取、说理方式、受众面向方面共享类似的偏好；司法领域的职业法律人们严守法条、回避“人情”，即使唇枪舌剑也不依靠动人心弦的词语语句；相反，法条和法理的辨析成为主流。

这种横向的、1935年内部的对比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通过将本案置于法律近代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区别更存在于纵向上。学界广泛关注的清代司法传统有着诸多方面，其中“情、理、法”的断案方式可以说最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然而，这种司法传统在刘景桂案中却几乎未曾体现——也许媒体的评述尚会兼顾三者，但职业法律人们已经放弃了这样的论证思路。

“天理，人情”的息声和“国法”的一家独大，表现着民国法律文化与清代司法传统之间明显的对立与割裂。而这种断裂——无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越发成为了主流。正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双重对比，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简单案件的复杂层次：我们看到独立的、共享同一套法律文化的职业法律人群体已经出现，我们也看到了司法审判的新方式。诚如赖特·米尔斯在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说，“要努力避免把人理解成孤零的碎片，或是独立自在即可领会的领域或系统”。<sup>[6]</sup>对本案判决书、起诉书、辩护状、法律评述进行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刘遯情杀案并不是孤立的、自为自在的个案，更是司法近代化中的个案。案件反映的也绝非本案一案的法官、律师、检察官们的特点，更是司法近代化浪潮中职业法律人群体的共同之处。总之，通过对刘遯情杀案这一个案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司法近代化真正实现之前，一个独立的现代法律职业群体已经形成了。

[1] 龚汝富、余洋：《透过民国时期的法官与律师看司法腐败的生成——以江西地区为例》，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3期。

[2] 侯欣一：《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版，第648页。

[3] 尤陈俊：《法制变革年代的诉讼话语与知识变迁——从民国时期的诉讼指导用书切入》，《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第24页。

[4] 张闯：《司法近代化研究——价值转换与发展趋向之考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

[5] 黄源盛：《晚清民国的社会变迁与法文化重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3期。

[6] [美]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第318页。